

中国近代爱国人物故事丛书

主编：张海鹏 徐辉琪

变革启蒙先贤

● 刘永光 ● 福建教育出版社



中国近代爱国人物故事丛书

张海鹏 徐辉琪 主编

变革启蒙先贤

刘光永

福建教育出版社

(闽) 新登字 02 号

责任编辑：林冠珍

封面设计：谢从容

2-637/07

中国近代爱国人物故事丛书

变革启蒙先贤

刘光永

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梦山巷 27 号 邮编：350001)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福建省尤溪县印刷厂印刷

(尤溪县团结路 8 号 邮编：3651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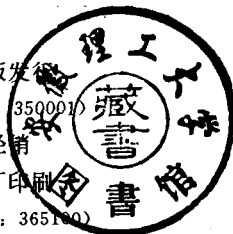
开本：787×1092 1/32 4.75 印张 98 千字 2 插页

1993 年 12 月第 1 版 199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300

ISBN7-5334-1215-x/G·077 定价：3.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由承印厂生产科负责调换



编者的话

在我们的祖国不断改革开放、追赶世界前进步伐的今天，青少年朋友，你们知道，曾有多少爱国志士、民族英才为此奋斗过吗？

1840年，西方侵略者的枪炮轰开了封建中国紧闭的大门，灾难深重的中国近代史也从此开始。从那时起，许许多多的爱国者开始认识到中国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为了寻求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道路，他们不畏艰难险阻，甚至不惜献出热血和生命，留下了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也留下沉重的历史教训。

在这套丛书里，我们要告诉青少年朋友的，就是这许许多多民族英才追求、奋斗的故事。他们中有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魏源；有主持变法图强的康有为；有民主斗士；有民族工商赤子；更有为民族的解放与进步而奋斗不息的共产党人……

这套丛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专家张海鹏、徐辉琪主编。丛书中收录了中国近代一百多位爱国人物的故事，分成14个分册出版，每册介绍一个领域或重大历史事件中的代表人物。无论在编排上，还是内容表述上，它都与已出版的各种爱国人物传记有所不同，不仅具有历史的真实性，还具有故事的生动性。内容丰富，情节曲折，文笔流

畅，亲切感人，特别适宜青少年朋友阅读。

我们希望，这套丛书能增进青少年朋友对近代中国的了解，增强民族自信心，认识中国的过去，珍惜今天，为祖国的未来而奋发向上。

1992年12月

目 录



中国的但丁——龚自珍	1
“究心经世之务”	1
坚决支持禁烟	6
创言新疆建省	10
警世檄文	12
改革号角	20
雄浑诗篇	24
“师夷制夷”的先驱——魏源	34
“勤学罕觐”	34
“经世致用”	38
“修我伐矛，与子同仇”	40
编纂《海国图志》	45
“师夷长技以制夷”	49
“变古愈尽，便民愈甚”	55
七年地方官	59

笃实践履之士——包世臣	62
“贾生”之才	62
笃实学风	64
一心“振威雪耻”	67
社会思想	72
承前启后的时代号手——冯桂芬	78
林则徐的得意门生	78
“今天下之乱谁为之？”	80
大前提下的变革主张	83
“鉴诸国”、师“蛮貊”	90
闻名海外的洋务通才——马建忠	96
博览西书	96
“洋务通”	99
“富民”论	102
改革主张	105
汇通中西文化的饱学之士——王韬	114
“墨海”岁月	114
逃居香港	118
漫游欧洲	122
精卫衔木	126
呼唤改革	133
魂归故里	141

中国的但丁

——龚自珍

18 世纪末到 19 世纪上半叶，是中国封建社会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转折时期，也是大清王朝由“太平盛世”走向日薄西山、“天崩地解”的大滑坡时期。近代中国维新思想的著名先驱龚自珍，就生活、战斗在这个时期。他以自己那些洞明事理、愤激辛辣的诗文（包括 300 多篇散文和近 800 首诗词），尖锐地揭露了清王朝的黑暗腐朽，探索社会兴亡的根源，为当时的思想界敲起了醒世的晨钟。

恩格斯曾说：但丁在欧洲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在中国历史上，龚自珍也恰是这样一位转折时代的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和诗人。他愤怒抨击封建末世，呼唤未来，向往改革，是近代中国“慷慨论天下事”的第一人。

“究心经世之务”

龚自珍，又名巩祚、易简、自邛，字璠人、爱吾、伯定，

号定庵、观实相之者，晚年又号羽琤山民。浙江仁和（今杭州）人。1792年（清乾隆五十七年）生。

龚自珍孩提时代，正值清王朝由盛世滑向衰世的起始阶段。他4岁那年（1796），做了60年皇帝的乾隆将宝座让给了他的儿子嘉庆。就在这一年，爆发了清朝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白莲教起义。这次起义爆发于湖北荆州（今江陵）一带，波及湖北、河南、陕西、甘肃、四川五省，迫使清廷几乎动员了所有的军队，耗费了一亿多两白银，历时九年，直到1804年才最后镇压下去。在农民起义的沉重打击下，大清王朝已开始显露出“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的末日征兆了。

但是，当时的龚自珍毕竟年龄尚小，还不可能对社会危机有怎样的认识，而且是在“三代京官”的家庭中饱受着封建主义正统教育的熏陶。他的祖父龚昶身，一生喜欢研究历史，曾经批校过《汉书》，官至内阁中书、军机处行走。父亲龚丽正，也酷爱史学，写有《国语补正》等史学著作，曾在礼部和国史馆任职，又在地方上做过苏松太兵备道，署江苏按察使。母亲段驯是著名文字学家段玉裁的女儿，是颇有名气的女诗人，著有《绿华吟榭诗草》。这个家庭不仅具有优裕的物质生活条件，而且颇具书香门第的家学传统，为龚自珍的成才，可谓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况且，龚自珍从小天资聪敏，醉心读书，乐于钻研。6岁时，他便在母亲的辅导下开始读书作诗。后来，又跟外祖父诵习《说文解字》。11岁那年，他随父亲入京，在家庭教师宋鲁珍的指导下学习。此后，他经常跟随父亲和老师南来北往，东游西走，对祖国的名山

大川、地理形胜和风土人情，多所见闻。他14岁开始考证古今官制，15岁写编年诗，16岁时读《四库全书总目》，开始收集、搜罗罕见古籍，钻研图书目录学，17岁收集古代钟鼎碑刻，研究金石文字学，撰写《金石通考》一书。由于他从小就受到严格的封建文化传统的熏陶，对经学、史学、古典文学、诸子百家，或深入研究，或广泛涉猎，打下了相当扎实的学问功底，所以，20来岁时，他便成为一名才华横溢的诗人和学识渊博的学者了。

龚自珍潜心向学的青少年时代，正值乾嘉考据之学盛行，他的师友当中，又有不少考据学者、八股“高手”，加上祖父辈的熏染，使他从小便养成考据的癖好，懂得如何“以字说经，以经说字”。假如不是“世变剧烈”，迫使他走上另一条道路，他很可能沿着阎若璩、戴震、王念孙、段玉裁等人开辟的路子走下去，成为一位著名的考据学者。龚自珍的外祖父、著名古文字学家段玉裁老先生对他的这位外孙寄意深切，特意为他起名为“自珍”、“爱吾”，还专门写了一篇《外孙龚自珍字说》，说明只有爱人才能自珍自爱，自珍自爱才能更好地爱人的道理。并谆谆告诫他：务必读经治史，走学而优则仕的“正途”，“努力为名儒，为名臣，勿愿为名士”。

然而，风雷激荡的社会现实，迫使龚自珍没有亦步亦趋地朝着外公指点的方向，去沿袭文字考据学的老路，却走上了以“匡时济世”为宗旨的经世学派的新路。龚自珍21岁那年（1813），白莲教的一个分支——天理教，又在河南发动大规模起义。其中，林清率领的一部分天理教群众还一度打入北京的皇宫，紫禁城隆宗门的匾额上，至今仍留有他们当年

射下的箭头。参加这次起义的，不仅有农民、手工业工人、小商人，甚至连皇宫里的小太监们也预谋响应。足见当时阶级对抗和社会矛盾是何等的尖锐激烈！在农民起义浪潮的震荡下，龚自珍再也无法埋头故纸堆了！就在这一年，他开始写作评论性的文章，针砭时政，讥讽流俗，“究心经世之务”。

1819年，龚自珍毅然抛弃自己曾醉心多年的训诂考据之学，师事今文经学家刘逢禄，力攻《公羊春秋》，专心探讨匡时济世之策，走上了“经世学派”的道路。为纪念自己治学之道的这一重大转变，他曾情不自禁地吟诗道：“昨日相逢刘礼部，高言大句快无加。从君烧尽鱼虫学，甘作东京卖饼家！”很显然，正是迫在眉睫的社会危机，使他将自己为人处世与求道治学的主题，贴近了现实生活和时代变迁的脉搏。

龚自珍所以能痛下决心，抛弃帖括之学，走上经世派的道路，与他在科举仕途上的坎坷也是分不开的。19岁那年，他首次应顺天乡试，考中副榜第28名。乡试的副榜贡生，在一般人心目中还不是正式举人，比秀才高不了多少。龚自珍不满意这个“出身”，因此他在22岁和25岁时两次再应乡试，希望取得正式举人的资格，可是都名落孙山。直到27岁那年（1818）第四次应乡试，即嘉庆皇帝六旬万寿恩科，终于考中第四名举人。第四名举人是所谓“五经魁”之一，这使龚自珍大受鼓舞，满以为科名从此一帆风顺，可望置身于卿相之列。不料事与愿违，龚自珍再应进士试，却连连落第。直到1829年，38岁时，参加第六次会试，才勉强中了第95名，殿试为三甲第19名，连个翰林也没考上。

科举出身的高下，在当时是极关重要的。龚自珍既然在

科举制的金字塔上未能“掇取巍科”，就已给他日后的仕途投下了阴影。加之，他的言行举止不落陈规旧套，不随波逐流；文章词赋别开生面，乐于讥切时政，喜好针砭习俗；这便引起了那些“礼法之士”和既得利益者们的忌恨和排挤，使他在仕途上一直“困厄下僚”，先后在京师做了20年内阁中书、武英殿校录、宗人府主事、礼部主事等冷署闲曹中的小官。这使他深感怀才不遇，报国无门。

由于久居京都官场而郁郁不得志，看到的尽是一些醉心功名利禄，媚上欺下，蝇营狗苟，寡廉鲜耻的庸人，龚自珍逐渐意识到清朝统治的腐朽昏溃，开始产生了变革现实的政治理想。

“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在京期间，龚自珍与林则徐、魏源、黄爵滋等人意气相投，过从甚密，常常在一块谈论时政，探讨社会改革方案和国家的前途。由于他们这伙人都主张变革图强，具有共同的政治倾向，逐渐形成与顽固守旧势力相对立的改革派。在诸友人中，龚自珍与魏源交往最为密切，他俩经常聚会、通信，研究经世致用之学，探讨革新政治之道，两人都以文才横溢、思想敏锐、见识卓越而著称于世，时人并称“龚魏”，十分推崇。

当时，思想界在儒家理学的统治下，万马齐喑。清朝统治者为维护其腐朽没落的封建统治，自入关以来，一直实行文化专制政策，大兴“文字狱”，借以钳制人们的思想。在这种高压政策下，大多数知识分子要么埋头故纸堆中，考据训诂，皓首穷经，只求谋生，不谈国事；要么屈服于封建统治者的权势，奴颜婢膝地为清王朝歌功颂德，粉饰太平。龚自

珍对当时这种苟安怯懦的士林风气十分鄙弃，他矢志“经世济民”，以国家兴衰、社会治乱为治学要旨，“但开风气不为师”。

然而，在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之下，知识分子要关心世情民隐、倡言天下大事，又谈何容易。居京期间，龚自珍曾对改革吏治、振兴国力、开发和防守西北边疆等问题，提出不少积极的建议，不但没有被当轴者采纳，反而遭到冷落和排挤。1839年，在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已隐约可闻之际，龚自珍因讥议时政，得罪了奸臣穆彰阿，无法继续在京师立足；同时，他也深感清王朝“四海变秋气，一室难再春”，再也不愿为它效命卖力了。于是，便以待奉双亲为名，辞官南归，在苏、浙两省任教。

坚决支持禁烟

在北京做官期间，龚自珍虽然身在“冷署闲曹”，但为爱国热情所驱使，时刻关心着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当时，他在这方面关注最多的，是禁止鸦片输入。

鸦片问题，是当时中国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龚自珍深感鸦片给中国社会带来深重的灾难，因而对西方殖民者向中国强行输入这种毒品的罪恶活动深恶痛绝。他痛斥英国侵略者对中国的鸦片输入，名为贸易，“实乃巨诈”。他把鸦片称为“食妖”，即食物中的妖魔，指出“食妖”泛滥不止，必使人民“病魂魄，逆昼夜”，使国家“丧金万两”，财源枯竭。但是，鸦片当时已成为不少封建官僚糜烂生活的必需品，要

严禁烟毒是十分艰难的。他在诗中愤然痛斥道：

津梁条约遍南东，谁遣藏春深坞逢？

不枉人呼莲幕客，碧纱幙护阿芙蓉。

“津梁条约”，指鸦片战争前清廷向沿海各地发出的禁运、禁吸鸦片的条令。“藏春坞”，本为北宋大官僚刁约在丹徒家乡建的花园，“藏春”与“藏花”（阿芙蓉，即鸦片）双关，这里指暗藏的鸦片馆。“莲幕客”，南齐时，有人比拟尚书令王俭的幕府为莲花池，后来人们便称幕府为“莲幕”。因莲花又称水芙蓉，所以，末句中的“阿芙蓉”是双关语。诗一开头就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朝廷颁布的禁烟令已遍贴于东南沿海一带，但鸦片烟馆里却照样有人在吸食鸦片，究竟是谁给他们提供的方便呢？原来，清政府虽曾颁布过许多次禁烟令，其实禁烟者很多就是大烟鬼！龚自珍的挚友林则徐就曾愤慨地说：“盖以衙门中吸食最多，如幕友、官亲、长随、书办、差役，嗜鸦片者十之八九，皆力能包庇贩卖之人”，“现任督抚，嗜烟者约占半数，若辈岂肯回扳石头压自脚？则阴持两端，模棱其辞，势所必然。”在清政府内部，实际上已经形成一个贩毒、吸毒的庞大集团。这些人利用职权，包庇、纵容外国侵略者的走私活动，使鸦片走私成公开、半公开状态。

在另一首诗中，龚自珍写道：

鬼灯队队散秋萤，落魄参军泪眼荧。

何不专城花县去，春眠寒食未曾醒。

这里的“鬼灯”，是指晚上到烟馆里吸食鸦片的人手里提着的照明灯笼，秋夜长空，这种灯笼像萤火一样，一个跟着

一个，鱼贯而行；而手提灯笼的人由于烟瘾发作，个个像失意的官吏，没精打采，涕泪交流。诗中的“花县”，在历史上是有所指的，据说晋代潘岳在河阳县当县令，喜种花草，后人因此称河阳县为花县，这里是借指那些盛产芙蓉的地方。寒食节，按我国农村旧俗，是禁止生火的，这里把禁止烟火和禁止吸食鸦片牵合起来，语义双关。短短四句，既形象生动，又充满着辛辣的嘲讽，维妙维肖地勾画出了封建官僚们对禁烟令阳奉阴违的丑态。

鸦片战争爆发前的十年间，龚自珍和他的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林则徐、张际亮、黄爵滋、汤鹏等，曾在北京以诗会友，结成宣南诗社，相互应酬唱和，切磋诗艺，交流思想。他们都是极力主张禁止鸦片输入，抗击英国侵略的爱国志士，都以救亡图存、济世安民为己任。

1839年1月8日，当林则徐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由北京前往广州查禁鸦片时，龚自珍特地写了一篇《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从政治、经济和军事各个方面为禁烟运动筹划了一套完整的方案，提出一系列积极建议。他认为，禁烟措施必须严厉、坚决，“刑乱邦必用重典”，对“贩者、造者”和吸食者都应处以死刑。他预料到，严禁鸦片必然会引起英国侵略者与“奸民”的破坏和捣乱，提出对这些人绝不可心慈手软，必须“就地正典刑”，彻底打击他们的嚣张气焰。他还提醒林则徐，反对和阻挠禁烟的人，不仅有“夷人”和“奸民”，而且在粤省官吏、幕僚、游客、商贾、绅士中都会有。对于那些“黠猾游说”，“貌为老成迂拙”的破坏者，一经发现，“宜杀一儆百”，千万不可“为若辈所动，游移万一”。他

预感到西方侵略势力绝不会眼看着林则徐采取断然措施禁绝鸦片，很可能冒险发动战争。为此，他建议林则徐去广东要多带军队，还要多带些能工巧匠，修整武器，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

龚自珍认为，在坚决禁烟、积极进行反侵略战争准备的同时，对那些正当的中外贸易，则应继续维持。这样做，既可分化敌对势力，又可增加财政收入，促进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和国家的富强。他期望林则徐在两年任内，能为全国赢得一个“银价平，物力实，人心定”的大好局面。林则徐到广东后推行“奉法者来之，抗法者去之”，既严禁贩运鸦片，又鼓励正当贸易的正确方针，龚自珍这一建议显然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龚自珍不仅在精神上支持林则徐，而且还表示他愿随林则徐一道南下，直接投身于禁烟运动和反侵略斗争。林则徐对龚自珍的爱国热忱和坦诚真挚的勉励十分感动，称赞龚自珍“责难陈义之高，非谋识宏远者不能言，而非关注深切者，不肯言也”，表示将毫不妥协地与外国侵略者斗争到底。但考虑到禁烟斗争的复杂情况，林则徐通过友人婉言劝阻了龚自珍的广东之行。

龚自珍虽然未能南下，但渴望参加反侵略斗争的急切心情却久久不能自己。他在一首怀念林则徐的诗中，满怀激情地写道：

故人横海拜将军，侧立南天未藏勋。

我有阴符三百字，蜡丸难寄惜雄文。

诗中写道，我的老朋友最近被任命为横海将军，他像顶

天立地的南天一柱，辛勤战斗在祖国的南大门。现在，禁烟斗争还没有结束，大功尚未告成。我有一篇向他陈述战守计策的文章，可惜没有办法把它寄去，真是白费了我这篇不寻常的文章啊！诗人坚决支持禁烟，渴望亲临前线的战斗豪情跃然纸上。

鸦片战争爆发后，龚自珍更加义愤填膺，坚决主张抗战。直到1841年夏秋间去世前，他还写信给驻防在上海的江苏巡抚梁章钜，表示要辞去教职，前往上海共商抗英大计。

创言新疆建省

龚自珍的爱国情怀与卓越见识，在关于边疆历史地理的研究，尤其是对西北边疆开发和建设的主张中，同样得到了集中的反映。

鸦片战争前20年间，龚自珍一直怀着“沉沉心事北南东”的心情，致力于祖国边疆历史地理的研究。他把边疆历史地理的研究称为“天地东西南北之学”，也就是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的大学问。当时，“举国方沉酣太平”，而龚自珍与魏源等经世派人物，却已预感到西北边疆的外来威胁，时刻关注着国家的安危，“恒相与指天画地，规天下大计……而最注意边事”。1820年，龚自珍写了《西域置行省议》这篇著名论文，建议在新疆建省，以加强西北边疆的开发与建设。为此，他建议清政府从中原地区移民西徙，在西北屯田筑城，设立行政建制，加强管理，并允许移民开垦、耕种西部土地，发展社会生产。他还建议从八旗驻防旗人中抽派部分丁口西迁，